

中华经典藏书

李逸安 译注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藏书

李逸安译注

三字经
千字文
百家姓
弟子规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李逸安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9.3(2009.4重印)

(中华经典藏书)

ISBN 978-7-101-06546-6

I. 三… II. 李… III. 汉语-古代-启蒙读物
IV.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9813号

-
- 书 名**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译 注 者 李逸安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藏书
责任编辑 王水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3月北京第1版
2009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00千字
印 数 10001-20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546-6
定 价 12.00元
-

前 言

一 蒙书成编溯原始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都是中国古代蒙学读本中流传广泛、影响久远的经典之作。

蒙学读本也称“蒙养书”、“小儿书”，是专为学童启蒙教育编写的在庠序、书馆、塾学使用的课本。因儿童入学要先习文字，所以蒙学读本无不发轫于字书，见于著录最早的当推《汉书·艺文志》所载《史籀篇》，旧谓出自周宣王时太史籀之手，实则应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秦人编纂，全书为四言韵语，字体与石鼓文及金文相同。

秦代为统一文字，由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苍颉》、《爰历》、《博学》各七章字书，汉代则将其合成为一书，多以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编排为句，仍仿《史籀篇》用四言韵语，书名定作《苍颉篇》。

《史籀篇》与《苍颉篇》这种四四为句、以类相从的编写法，对后代蒙学字书的编纂形式影响很大。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字书的编写达到高潮，仅

著录在籍者就有数十本之多，而且均系名家大腕手笔，如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扬雄《训纂篇》、蔡邕《劝学篇》、班固《太甲篇》、陆机《吴章》、周兴嗣《千字文》、顾恺之《启蒙记》等，可惜的是这些蒙书多已亡佚，至今完整可见的仅有《急就篇》和《千字文》，不过以传播影响而言，《急就篇》就远逊于《千字文》了。

二 奇才巧缀《千字文》

《千字文》出自南朝才子周兴嗣手。周兴嗣(?—521年)，字思纂，南梁陈郡项(今河南项城)人。祖上曾任汉太子老师，家学素养厚重，本人更是以文学知名当时，深得梁武帝萧衍赏识，授官员外散骑侍郎，奉命编纂国史，著有文集百余卷。

《千字文》原是周兴嗣奉诏编缀的一篇命题文字，篇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梁书》于其虽有记载，但过简略，好在宋人《太平广记》叙述尚详，为我们保存下来了《千字文》成书情况：

据说《千字文》传出后，世人初始一片疑惑，搞不清为什么周文竟是早其一百多年前的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写？

原来梁武帝为了教诸王学习书法，让人在王羲之遗墨书迹中拓出一千个不相重复的字，写在纸片上，因零碎杂乱没有次序，于是召周兴嗣说：“你才思敏捷，可用此千

字给我编一篇韵文出来。”不料周兴嗣仅用一个晚上就编好了，只是他的两鬓也在一夜之间都花白了。

《千字文》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用被指定的无一重复的一千个单字，条理贯通叙事有序地吟咏了关于天文、博物、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包罗万象的诸方面知识，且结构严简，文采飞扬，对仗工整，协韵流畅，令人叹服称绝。其既可识字、学书、习文，又可增广见闻，兼能启蒙儒家伦理思想，成为我国历史上综合性蒙学读物的开山之作，对后代如《蒙求》、《三字经》、《龙文鞭影》、《弟子规》等一系列蒙书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影响深刻。

《千字文》自隋代开始大为流行。南朝陈末至隋初，王羲之七世孙书法家智永和尚为满足时人需求，曾临摹了《千字文》八百册散发赠友，江南各个寺院也都保留了一本，对《千字文》的广为流传功不可没。到清代《千字文》已成为流传最广、最久的蒙学课本，几乎长幼咸知，以致文书编卷都采用天、地、玄、黄……来排列类分。清初学者顾炎武称赞《千字文》“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道出了其传世经久的缘故。周兴嗣《千字文》后，唐《梵语千字文》、宋《叙古千字文》、《续千文》、《重续千文》、元《稽古千文》、明《广易千文》、《正字千文》、清《训蒙千字文》、《续千字文》等模仿续貂之作纷纷问世，虽无一能与周文媲美抗衡，但却可以窥见周文影响的非同一般。

三 赵钱孙李《百家姓》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大概人人可以脱口诵出这样的句子，也大概鲜有人不知这是出自《百家姓》。

《百家姓》是集中华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识字课本，作者佚名，一般认为它是出自宋初五代十国的吴越宿儒之手，这从首句“赵钱孙李”的姓氏排列可见端倪：“赵”为宋朝国姓至尊无上，自然位列第一。“钱”是吴越国（在今江浙一带）王室姓氏，故居其次。吴越第五代王钱俶曾策应赵宋平定江南，至宋太宗时献国归宋，受封邓王，“孙”乃其正室王妃之姓，所以紧随“钱”后。“李”是与吴越毗邻的南唐皇帝之姓，且为当时华夏大姓，故排序第四。

《百家姓》之前，关于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上溯自商代甲骨文。战国时史官编撰的《世本》，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姓氏专著，它记述了黄帝至春秋时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是姓氏探源的珍贵历史文献，但是流传到宋代原书已渐散佚。之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姓氏著作就属《百家姓》了。与《千字文》等蒙书不同，《百家姓》虽说形式上也四四为句，合辙押韵，但是除了表示姓氏的汉字罗列，并不蕴含其他意义。它能穿越千年历史的漫长时空，流传至今，家喻户晓，与中国传统的以家族为中

心,按血统区别亲疏的宗祧观念密不可分。

中华姓氏形成的历史,可追溯到史前史时期,由于那时尚无文字,所以有关史料只能依靠夹杂有大量玄奇成分的神话传说口口相传,而表述某个氏族起源及祖先情况的神话故事,正是史前时期的主要历史内容。

华夏姓氏文化的核心人物是三皇五帝,他们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最早的统治者。尽管在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形象人神混杂且名目不一,但可尊之为三皇的,主要是由教人构木而居的有巢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捕鱼狩猎的伏羲氏、播种五谷的神农氏,补天造人的女娲氏组成。

五帝时代晚于三皇,其传说主要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部落联盟时期的历史,以《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为常见,即:黄帝(姬姓,号轩辕氏)、颛顼(号高阳氏)、帝喾(号高辛氏)、帝尧(号陶唐氏,名放勋)、虞舜(号有虞氏,名重华),其中尤以黄帝影响为最。另外还有炎帝(姜姓,号烈山氏或厉山氏)、太皞(亦作太皓,风姓,一说即伏羲氏)及少皞(亦作少昊,号金天氏,名挚)。

三皇五帝外,姓氏溯源的核心人物还有禹(也称夏禹、大禹、戎禹,姒姓,名文命)、皋陶(偃姓)、契(子姓)、伯益(亦称大费,嬴姓)、后稷(姬姓)。

上古有姓有氏。姓乃族号,表示血统,早期来源于部落图腾,故有以动植物为姓者如熊、虎、瓠、华等;又因经历母系社会,所以姓以女旁居多,如姬、姒、姚、姜、嬴等。

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又分出其他支系，散居迁徙到各处，这些分支便以氏作为区别。正如《通鉴·外纪》所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可见上古姓、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周代姓氏制度和封建宗法制度密切相关，只有贵族可以拥有姓氏，平民则无姓无氏。贵族中女子称姓，因为姓是用来“别婚姻”的，血缘共同的同姓间不能通婚。故贵族女子姓比名更重要，待嫁女子可以在己姓上加伯、仲、叔、季的排行来区别，如伯姬、孟姜、仲子等；出嫁后可加自己或配偶的封地、谥号等区别，如齐姜、秦姬、敬嬴等。

贵族中男子称氏，因为氏是用来“别贵贱”的，可以表示所出何支何系，是嫡是庶，祖上身分等级、功勋地位如何。氏的情况较为复杂，诸侯以封国为氏，如郑捷（郑文公），郑是氏，捷是名；齐环（齐灵公），齐是氏，环是名。卿大夫多以封邑或居地为氏，如屈完、解狐封邑在屈、解；东门襄仲、南宫敬叔的氏是居住地。还有司马、司空等以官名为氏；孔、叔孙、仲孙等是以祖先的字为氏；庄辛为楚庄王之后，是以祖上谥号为氏；巫、陶、龙等则是以技能为氏。

战国以后人们开始以氏为姓，到汉魏时期姓、氏逐渐合一，平民百姓也可以有姓了。而且随着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产生了许多原非汉族的复姓如宇文、贺兰、拓跋、哥舒等。

姓名之外，古代男子二十岁束发加冠举行冠礼、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举行笄礼时还要取字。字与名在意义上要有所联系，如屈原名平字原，鲍照字明远，宰予字子我。春秋时男子取字最常见的是加个“子”字，如公孙侨字子产，狐偃字子犯；还常于字后加父、甫表示性别，如伯禽父、仲山甫等。

除了名和字，古人还可以有别号，如苏轼别号东坡先生，陆游别号放翁。帝王、诸侯、大夫、高官死后还有谥号，褒义的如文、武、昭、穆等，贬义的有厉、炀、灵、哀等。谥号之外帝王另有庙号，如高祖、太祖、太宗等。

自汉武帝开始，封建皇帝登基后要有纪年的年号，在位时还可以改变年号重新纪年，称作改元，如汉武帝开始时年号为建元，后改元为元光、元朔、元狩等，先后用了十一个年号。明清皇帝不改年号，所以皇帝又多了个称呼，如明太祖朱元璋称洪武帝，思宗称崇祯帝，清圣祖称康熙帝，德宗称光绪帝。

封建时代不能直呼君主、尊长的名字，所以常常要改字或缺笔来避讳，它的直接影响是改变别人的姓名，如汉文帝名恒，春秋时的田恒在史籍中被改称田常；汉景帝名启，微子启改名成了微子开；康熙名玄烨，名字中有玄的一律改成元。古代律法中常常是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所以从高祖到玄孙的所有家族直系亲属及旁系亲属中的兄弟、堂兄弟等都会受到牵连，因此为避灭门之祸，出奔逃亡者常会被迫改姓埋名。

以上关于中华姓氏文化知识的简要梳理和概括，有助于我们对《百家姓》的进一步研习与解读。作为幼学启蒙读物，古人看重的是《百家姓》读来顺口、易于记诵的快捷识字功能。而今人更加重视的是其在寻根溯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一首深受海内外华夏儿女喜爱的歌曲这样唱道“天有情，地生根，黄河长出百家姓。百家姓，大家庭，赵钱孙李到如今……国有魂，民有心，自古中华第一经”，对此作出了极其生动的诠释。

宋编《百家姓》结篇于“司徒司空，百家姓终”，共收单姓 408 个，复姓 32 个，共计 440 个姓氏（不同版本间所收姓氏数目略有出入）。不过宋刻本今已不传，目前可见的仅有元代刊本。明、清以来出现了不少改编本，较著名的有以“朱”姓开头的《皇明千家姓》，以“孔”为首句、以“孟”为次句打头的康熙时《御制百家姓》，还有少数民族译本《蒙古字目百家姓》、《女真字目百家姓》等，虽然内容、格式各有特色，但无一能够取宋编本而代之。

本书选用的是在宋编基础上，又增收了单姓 36 个、复姓 28 个，总计 504 个姓氏的通行本《百家姓》，终篇结句于“第五言福”。虽然 504 个姓氏只占流传至今仍在使用的三千多个姓氏的六分之一，但是已经涵盖了我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实用性。

同时为了满足海内外中国人、华人华裔续写家族系谱，探寻血脉源出的需求，我们查阅了大量散见于各种相

关史籍和姓氏考略的专书专著、字典辞书，订正了其中不少史料史迹、人名地名的讹误，对本书 504 个姓氏一一注明了出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籍中关于姓氏的来源，许多采自神话传说，其中不乏神秘荒诞的色彩，而先民对于自己的祖先，也多有夸大虚饰之语。如《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先祖契的母亲简狄洗浴时“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族始祖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初欲弃之，因名曰弃”。类似的传说，我们在注解姓氏出处时，都酌情予以了收录保留，着眼点并不拘泥其符合史实的程度，而是充分肯定它们作为姓氏文化遗产中的绚丽奇葩所具有的传承价值和意义。

四 明经学史《三字经》

《三字经》世谓南宋王应麟作，民国前期又略有增补，主要是续添了宋以后直至清末的一段历史叙述。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庆元府（治所在今浙江鄞县）人。《宋史》说他自幼好学，九岁即通《六经》。淳祐元年登进士第，因长于经史考据，熟悉天文地理、掌故制度，故一再升迁，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深为理宗倚重。宝祐四年王应麟奉诏主持殿试，他称赞文天祥的策论“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荐擢文天祥

为进士第一。奸相贾似道专权时，王应麟屡屡抗颜抵忤，有人劝他屈节顺从，他回答：“迁相之患小，负君之罪大。”

正因为王应麟道德学问如此，他编撰的《三字经》才能在知识灌输、道德晓喻、文才词藻上多方面超越同伦，被赞誉“为千古第一奇书”。除《三字经》外，王应麟还著有《蒙训》、《补注急就篇》、《小学讽咏》、《小学紺珠》等一百余卷蒙学及文字学著作，足见其对幼学启蒙教育的重视和勤力躬行。

《三字经》以“人之初，性本善”起篇，依次叙述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七情，四书六经诸子，历史朝代更迭，最后以奋发勤学、显亲扬名的著名事例作结。将涵盖了上下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知识、传统伦理思想及识字教育浑然融为一体，句式灵活，编排巧妙，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其中“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等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警句格言而传诵至今。

《三字经》三三成句，简练易读，深受后人推崇。尽管西汉史游《急就篇》也曾用过三言来编排当时姓氏，但无论是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无法与《三字经》相提并论，所以《三字经》被公认是“开三言韵语蒙书之先例”的蒙学读本。

与《千字文》一样，元、明以后除了专供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文的《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外，模仿《三字

经》的增改新编本也时有出现，但都未能广泛流传开来。今人借鉴《三字经》编写的课本读物也不少，笔者印象较深的是一本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撰的《部首三字经》，其中如“女子好，田力男，日月明，小大尖。竹毛笔，白水泉，爪木采，舟皿盘”，介绍部首，合辙押韵，便于咏记，非常适合教学使用。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为相辅相成的整套蒙学读本合称“三、百、千”，《三字经》也因这样的排列而被称为“蒙学之冠”。其实如此排名，一方面是基于数字顺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三字经》在文字和内容上较之后二书要浅近许多，蒙童入读先教《三字经》，体现出了古人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正确教育方法。

五 启蒙养正《弟子规》

《弟子规》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学读本，原系清康熙时绛州（今山西新绛）秀才李毓秀编撰的《训蒙文》，后经乾隆年间贾存仁修订整理，改称《弟子规》广为流传。

李毓秀始终不过一介秀才，学位不高，但他一直以教书为业，对幼学启蒙教育的特点谙练熟稔，所以他编写的这篇训蒙文言简意赅，切合实用。

李毓秀之前，出自大儒名宿手笔的蒙学伦理读本已有不少，其中尤以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小学》最受尊崇。

全书辑录古圣先贤的嘉言善行，分编内、外两篇，内篇再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门，外篇则由“嘉言”、“善行”两门组成。然而《小学》名气虽大，说理却过于深奥，又多引古礼，加之难字太多且不谐时俗，在实际蒙学中不易推广流行。至于《三字经》与《千字文》虽较《小学》来得通俗，却是以综合教育为主旨，并不专注道德训示。而明代吕得胜父子所编《小儿语》、《续小儿语》，内容亦略显庞杂。

《弟子规》则不求其大，不贪其全，精选并紧扣孔子《论语·学而》篇第六章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不过二十五字的这句话，匠心独运，以三言韵语阐释、演绎成包括“总叙”在内的五个部分，规定了子弟居家在外所应遵循的礼仪规范和言行准则，其核心为孝悌仁爱信。全文一千余字，好懂易诵，具有学规学则功能，甫一问世便大受欢迎，其影响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进入新世纪，国学热不断升温，少儿经典诵读更是波推浪涌、方兴未艾。有意思的是成书较晚的《弟子规》，不但在各地纷纷开办的国学班及中小学里大受重视，而且还被有的公司职场指定为员工的必读书，开工之前全体员工捧读《弟子规》的场景，甚至引发了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被视作是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这些现象表明，作为一个礼治教化源远流长的国家，人们期望借助深厚的传统道德伦理来规范举止言行，激发人性向

善，弥补和纠正社会在法治逐步健全完善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种种缺失与不足。人们更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心底积淀根植，其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坚韧意志的潜移默化作用，将伴随他们一生成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全新社会历史时期，其作用无疑更显重要。这就是《弟子规》等蒙学佳著，其识字功能虽已日趋弱化，但在当代中国仍能普受欢迎、迅速传播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始终是应当坚守的原则。譬如《三字经》所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千字文》所乐道的“世禄侈富，车驾肥轻”，无不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必须分析指出，加以引导。尤其是青少年们心智尚未成熟，价值取向远未定型，更需要帮助他们正确诠释经典，作到“古为今用”。例如《弟子规》的“非圣书，屏勿视”，就可解读为：屏弃含有凶杀暴力、荒诞灵异、淫秽奢靡的图书音像，不要让其污染毒害我们的心灵。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既有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又富现代理想精神的社会栋梁，我们任重而道远。

考虑到读者学习诵读的需求，我们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合编入一册，排列次序仍循旧例。本书《前言》共计五个部分，则按蒙书成编的时间顺序，次第叙述，以助读者了解这些蒙学读物的编写流传情

况。由于《百家姓》原书仅录姓氏,为方便读者阅读查考,我们除在正文内标注了其姓氏出处外,还在“前言·三”中增加了不少相关知识内容。注音本应是僻冷生难字,但《百家姓》中的某些常用字,作姓氏时读音、声调有变,故亦标注指出。本书的注释详略不求划一,牵涉到历史上典章制度、事件人物的尽可能详注,以满足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之需。译文则采用韵语,以求贴近原作风格。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李逸安

2009年2月